

论安史之乱对山东经济发展的影响

孙涛¹,张晋光²

(1.临沂大学 保卫处,山东 临沂 276005;2.山西财经大学 经济学院,山西 太原 030006)

摘要:山东是唐朝安史之乱的主战场,战乱给山东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严重破坏。战争导致大量人口流失,造成劳动力不足,土地大片荒芜,粮食产量减少,对山东经济危害至深;由于水利设施遭到严重破坏,大大降低了抗灾、减灾能力,严重影响到农业生产的恢复,造成战后山东社会经济长期不振。

关键词:安史之乱;山东经济;影响

中图分类号:K242.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6051(2012)01-0101-05

收稿日期:2012-01-10

作者简介:孙涛(1979—),男,山东蒙阴人临沂大学教师,硕士。

李渊建立唐朝,在地方实行州县制度。及至唐太宗即位,为加强国家管理,裁并全国州县,按照“山川形便”的原则,分天下为十道:关内、河南、河东、河北、山南、陇右、淮南、江南、剑南和岭南,即所谓的“贞观十道”。河南道辖境“东尽于海,西距函谷,南濒于淮,北薄于河”,相当于今河南、山东的大部及安徽、江苏北部地区。河北道辖境“东并于海,南迫于河,西距太行、恒山,北通渝关、蓟门”^①,相当于今河北大部、京津地区、辽宁西部和河南、山东黄河故道以北。今天山东省辖区均在河南、河北两道范围之内,其主体在河南道。在长达八年的安史之乱中,黄河南北是战乱的集中地区,对山东经济社会造成了严重破坏,严重影响了山东地区经济的发展。

一、安史之乱在山东的主要交战经过

玄宗天宝十四年(755年),身兼平卢、范阳和河东三镇节度使的安禄山,以奉诏讨伐杨国忠为名,在幽州(今北京,以下均为州治)突然起兵反唐。他亲率部兵及同罗、奚、契丹、室韦等族十五万精锐步骑,号称二十万众,大举挥师南下。河北是安禄山的辖地,“所过州县,望风瓦解,守令或开门出迎,或弃城窜匿,或为所擒戮,无敢拒之者。”^②唐朝守备空虚,无人敢敌,叛军势如破竹,直逼河南。“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③,安禄山兵变震惊全国。唐玄宗紧急募兵遣将,抢占军事战略要地,全力阻击叛军进攻。在叛军铁骑猛烈攻击

下,唐朝军队在河南接连受挫,安禄山杀进洛阳,双方主力军队在潼关对峙。此时,山东曹州(今山东定陶西)、濮州(今山东鄄城东北)也相继陷落。叛军又由汴州(今河南开封)和宋州(今河南商丘)向东侵掠,州县官更多望风而逃,惟有郓州(今山东东平东北)和齐州(今山东东阿东北)官吏领兵抗敌。

天宝十五年(756年)正月,安禄山在洛阳称帝改元,此时,唐朝政府和安禄山、史思明叛军已经在黄河南北展开了激烈的拉锯争夺战。

河北沦陷后,继恒州(今河北正定)刺史颜杲卿后,德州(今山东陵县)刺史颜真卿又起兵,河北十七州纷纷响应,反抗叛军烧杀劫掠。二十万河北义军,与叛军展开激烈战斗,收复了许多失地,切断了叛军后方交通。河北战局突变,史思明、蔡希德带兵回救河北,血腥镇压义军,河北州县得而复失。虽然如此,河北人民仍自发组织抗敌,队伍少则一万人,多至两万人。河北战争形势紧迫,李光弼、郭子仪奉命出师,大败史思明。安禄山调兵增援,又为郭、李联军击溃。为配合唐军主力作战,颜真卿攻取魏州,杀敌一万余人,又在堂邑败敌。唐朝军民群起反抗,河北州县失而复得。叛军后防再度吃紧,安禄山军心动摇,打算放弃洛阳,逃归幽州。

河南战场。唐军先是夺取宋州,又收复曹州。为阻止叛军侵入江淮,真源(今河南鹿邑)县令张巡坚守雍丘(今河南杞县),屡次击败来犯之敌。山

南东道节度使鲁灵则在湓水以南(今河南叶县北)阻敌,兵败后退保邓州(今河南邓县)。此时,叛军又攻占兖州(今山东兖州)、郛州和曹州。

玄宗急于收复洛阳,催促唐军出关杀敌,结果遇伏大败。潼关要塞失守,关中门户大开,战局急转直下。畿辅之地守军弃城而逃,玄宗带领王公百官仓皇出逃四川。不久,叛军占领长安。郭子仪、李光弼闻讯后,被迫收兵河北。于是,河北又再次得而复失,叛军夺取棣州(今山东惠民)、德州和博州。叛军复屠河北,后方得以巩固。此时,叛军气焰十分嚣张,势力达到极盛,“西胁汧、陇,南侵江、汉,北占河东之半”^④,北方大部分地区皆为叛军所有。

马嵬驿(在今陕西兴平)兵变后,唐王朝内部发生分化,玄宗继续南下成都。太子李亨则北上到达灵武(今宁夏灵武),即皇帝位,是为肃宗,改元至德。肃宗即位后,重建政府机构,征调西北兵入援,又向回纥借兵,转运江淮财赋,积极筹备反攻。

至德二年(757年),双方转入战争相持阶段。安史叛军调集重兵对太原、宋州(即睢阳郡)和邓州(即南阳郡)展开激烈的城市攻坚战。此时,洛阳叛军出现内讧,安庆绪杀死安禄山。回纥骑兵到达后,唐军乘机大举反攻,先后收复长安、洛阳,安庆绪败逃相州(今河南安阳)。唐军乘胜追击,除青州(今山东益都)外,收复了河南全部州县。唐朝虽收复两京,但战争远未结束,叛军还占有七州六十余城,拥有六万余众,仍为唐朝的劲敌。为重整旗鼓,继续与唐朝持久对抗,安庆绪派阿史那承庆去幽州征调部队,不料,史思明见机假装降唐,河北十三州归附朝廷。

乾元元年(758年),青州守军投降。唐军全力讨伐安庆绪。此时,史思明已再度反叛。为挽救危机,安庆绪以大燕皇位相让,向史思明求救。史思明遂发兵十三万救援,分三路出击,攻陷魏州,杀戮三万余人。乾元二年(759年),史思明在魏州称王,后对唐军发动猛攻,迫其全线溃退。不久,史思明诱杀安庆绪,收编其部众及所有州县,实力大增。为巩固后方,史思明返回幽州,自称大燕皇帝。后又带兵大举南犯,兵分四路渡过黄河,唐军迎战失利,叛军再度攻入河南,占领洛阳。上元元年(760年),李光弼攻克怀州(今河南沁阳),史思明无力取胜,派军进攻曹州、兖州和郛州,各地相继沦陷。同年,平卢节度使侯希逸归降,并率军南下青州抗击叛军。

上元二年(761年),史朝义杀死史思明,但仅羁縻安史旧将。叛军西进受阻,史朝义极力东侵,进攻兖、郛、青、密等州,但为唐军击败。宝应元年(762年),玄宗、肃宗相继亡故,代宗李豫即位。在回纥兵配合下,唐军再次攻克洛阳,收复河南失地,河北诸州纷纷归降朝廷。

广德元年(763年),史朝义兵败自缢身亡,安史之乱至此结束。

二、安史之乱对山东经济的破坏

唐代中期在北方地区发生的安史之乱,由于战争的持久、反复和残酷,使社会生产力遭受严重摧残,社会经济遭到极大破坏,造成无法弥补的经济损失,整个北方社会经济陷入极度混乱,成为唐王朝从强盛走向衰落的转折点。安史之乱对北方经济的严重破坏主要表现在人口急剧减少、耕牛大量宰杀、土地大片荒芜、水利严重破坏、交通运输不畅、物价波动异常和城市商业萧条等方面。这场战争对山东经济的严重破坏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一)城乡人口急剧减少,失去了大量劳动力

在战争中,唐朝和叛军都投入了大量的兵力,双方直接参加作战的正规军队有近二百万人次,民众自发组织的义军尚不在统计之内。这场惨烈的战争,造成了双方人员的重大伤亡。根据史籍上记载的一些将士损伤数字,双方阵亡将士总数应在一百万人左右,整个战争的伤亡程度可想而知。在长期战争的无情蹂躏下,凡是战火燃烧的地方,无不是尸横满道,白骨蔽野。地处河北道和河南道的山东地区也出现了这样的严重情况。博州为今天聊城地区,隶属于河北道,曾发生堂邑、博平等重要战役,仅堂邑一战,唐军就歼敌一万人。战争不仅造成双方将士伤亡惨重,而且使大量无辜平民惨遭杀戮。“自禄山肇祸,瀛、博流离;思明继衅,赵、魏埋厄。粉榆井邑,靡获安居,骨肉室家,不能相保。”^⑤战前,博州52631户,战后减少了50201户,降至2430户,降幅高达95%,居山东之首。德州是河北道另外一个山东重灾区,人口降幅也是十分惊人,高达89%,从战前的83211户,降至9356户,减少了73555户。河南道的山东地区也是如此。棣州在战前的户数为39150,战后下降到5447,减少了33707,降幅达到86%强。战前,曹州有100352户,兖州有87987户,郛州有83048户,青州有73148户,齐州有62485户,濮州有57782

户,由于《元和郡县志》缺载,无法知道战后各州户数,但参考上述统计数字,这些战区的人口也必降至千位。离主要战区较远的密州地处偏远地区,人口本来较少,只有28292户,这时若出现一定程度的下降,无疑是雪上加霜。

由于人口大量死伤和逃亡,造成劳动力不足,土地大片荒芜,粮食产量减少。在生产水平低下、自给自足的封建农业社会里,人口是改造自然的最终决定力量,作为生产力主要构成要素,劳动力的多寡与社会生产密切相关,是衡量一个地区生产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人口的减少会严重影响当地经济的发展。因此,社会劳动力严重不足,对山东经济危害至深。

(二)水利设施被毁,抗灾能力降低

根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战前山东各种水利工程有五项,仅在沂州临沂县就建有十五处陂塘,这些水利设施灌溉了大片农田,有力推动了山东农业经济发展。水利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因素,但水利事业的发展又受到社会政治条件的制约。在安史之乱连年战争中,由于封建统治阶级无力驾驭社会,根本无暇顾及水利的修护,水利机构和法令形同虚设,水利工程失去了及时管护而被荒弃。由于山东地区成为战场,一些水利设施甚至直接遭到战火的严重破坏。交战双方都采用“以水代兵”的方式攻击对手,许多河流被频频决断,多次发生人为决堤灌城事件。黄河是我国的主要大河,以善淤、善决、善徙而闻名,水患十分严重。由于泥沙含量大,流经下游变为地上“悬河”,河堤高于地面几米至十几米,一旦被决开大堤,就会淹没众多城镇和大量良田,给当地造成灾难性后果。乾元二年(759年),当史思明侵入河南时,唐朝长清(今山东长清)守将李铣决开黄河,齐州属县长清、禹城一带遭受了严重河患,大水淹没了禹县城(今山东禹城)。《太平寰宇记》有记载说:“逆党史思明侵河南,守将李铣于长清县边家口决大河,东至县,因而沦溺,今理迁善村。”^⑥由此揭开了唐五代黄河泛滥频繁发生的序幕。人为决堤不同于自然决堤,它完全出于战略目的的需要,受决堤位置和方式的控制,通常比自然决堤造成更大的破坏。在战争中,决堤者多选择战略要地、地势较高处,决堤后水势较大,淹灌速度快,对人民生命财产和城市造成的危害较大。而且,决堤者常常出其不意,掘开口门大,溃水快,因此,人民群众无充足的逃亡时间,破坏性更强。由于决堤发生在战乱年

代,有司无暇关心治河事宜,常造成长期泛滥,灾害历时很久。无论战争结果如何,每一次人为决堤,均给当地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灾难。人为决河不仅冲毁城镇,漂没房舍,溺死人畜,破坏良田,交通中断,人民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疾病流行,终日挣扎在贫病交加的死亡线上,而且还对当地的地形、地貌产生了重大影响,大量泥沙堆积导致了地下水位升高,土壤沙化、盐碱化增强,有机质成分减少,土地肥力下降,生态系统脆弱,环境承载力减小,人居环境恶化,使区域经济发展速度减慢。这些河流决溢后,又久不修治,洪水灾害肆虐,严重危害农业生产。在战乱和水患双重逼迫下,灾区的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封建社会以农业为本,农业是主要经济产业,而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水利的发展对经济发展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由于水利设施遭到严重破坏,大大降低了抗灾、减灾能力,严重影响到农业生产的恢复,造成战后山东社会经济长期不振。

三、战后山东经济的艰难恢复和缓慢发展

在安史之乱中,两河地区成为“四战之地”,双方在此交战七年之久,是战争中最激烈的战场,对经济的破坏也最为严重,因此经济恢复也最为艰难,对山东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战争结束后,博州和德州为安史降将、魏博节度使田承嗣的辖地,为实现割据自保,他趁仆固怀恩三年叛乱和吐蕃连年入寇之机,大力发展军事力量,不向中央交纳赋税,壮大自己的经济、军事实力,形成政治、经济上的半独立状态。由于其“重加税率,修缮兵甲”(《旧唐书》卷141,《田承嗣传》),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就把兵力扩充至十万。不仅如此,他还从中挑选精兵组成牙军,后来成为左右藩镇局势的决定性力量。战后在劳力严重缺乏的同时,繁重兵役又相继兴起,许多青壮劳力被征入伍。为供应大量军队的给养,魏博镇“老弱事耕稼,丁壮从征役”(《新唐书》卷210,《藩镇传序》)。这样的农村人口生产结构,不但造成农民负担加重,而且严重影响了农业发展水平。军事实力是以经济基础为保障的。为巩固自身统治和保证军队作战的需要,魏博镇也在试图恢复残破的经济。针对战后“民人离落,阡陌之内,十室九空”的境况,节度使田承嗣“体达化源,精洁理道,弘简易,划烦苛,一年流庸归,二年田莱辟,不十年间,既庶且富,教义兴行,魏自六雄升为五府”^⑦。此语

虽亦多溢美之辞,但也说明通过整顿苛捐杂税,招抚流民进行开垦荒地,魏博经济已逐渐有所起色。大历七年(772年),田承嗣上表以魏州顿丘、临黄二县复置澶州。

统辖山东大部地区是淄青节度使。宝应元年(762年),唐朝任命侯希逸为淄青、平卢节度使,领有淄、青、齐、登、莱、沂、密、棣等州。在其任职初期,《旧唐书·侯希逸传》说:“甚著声称,理兵务农,远近美之。”《新唐书·侯希逸传》也赞扬其“治军务农有状”。看来,侯希逸治理辖区经济最初是有一定成效的。但三年后,因其骄纵放任,内政混乱,又广建佛寺,游猎无度,致使百姓深受其苦,遂被将士所逐。永泰元年(765年)李正己被推举为帅后,却效仿魏博、成德、幽州“河朔三镇”,并与其暗中勾结,企图实现割据自立。为此,他“用刑严峻,所在不敢偶语”。实际上,自李正己以来,淄青节帅都是采取类似办法,以求稳定政权,因此割据长达六十年,严重影响了淄青地区的经济恢复和发展。在加强统治力量的同时,李正己也注意了当地的经济建设,“法令齐一,赋均而轻,拥兵十万,雄据东方,邻藩皆畏之”(《资治通鉴》卷225,《唐纪四十一》),故其军事地位得以巩固。此后,李正己带兵进攻相卫薛嵩,又参加平定汴宋留后李灵耀叛乱,积极扩大地盘,至大历十一年(776年),又将曹、濮、徐、兖、郛据为己有。这样,淄青镇就占有十五州之地,控制河南道东部的广大地区,即今日山东大部、河南和江苏一部。为充实军力,巩固统治,身兼海运押新罗渤海两蕃使的李正己“货币渤海名马,岁岁不绝”,积极开展对外贸易。后来,他又将镇治从青州迁至郛州,并加紧战争准备,严重威胁到唐朝的安全。

藩镇势力代表大土地私有者的利益,随着经济的有所恢复,他们的军事实力亦有增强,为掠夺土地和人口,藩镇与藩镇、藩镇与中央之间战火逐渐增多,结束了战后短暂的社会稳定。先是在大历十年(775年)至大历十二年(777年),因魏博侵吞了相卫镇全部属地,唐朝下令各藩镇讨伐田承嗣,最后以双方妥协告终。这场战争对国家经济的破坏较大,史称:“兵连祸结,廩饩取资,暴赋急征,并间殫竭,男释耒耜,女废蚕桑,流离冻饿,挤于沟壑。”^⑧大历十三年(778年),魏博田承嗣病死,田悦继任为节度使。唐朝增修汴州城后,他与淄青等镇暗中勾结,防御唐朝进攻。建中二年(781年),德宗命令出兵讨伐成德李惟岳,魏博田悦、淄青李纳与李惟

岳联合抗唐。在唐军的猛烈进攻下,魏博伤亡惨重,成德被一分为三。幽州朱滔和王武俊又联合举兵反叛,解救魏博之围,形成新的“三镇连兵”。经过三年交战,魏博军队遭到重创,“士众死者十七八”(《旧唐书》卷141,《田承嗣传》)。在频繁战乱和自然灾害的破坏下,北方经济雪上加霜,贞元元年(784年)德宗发布的诏令反映了当时的现状:“顷戎役繁兴,两河尤剧,农桑俱废,井邑为虚。丁壮服其干戈,疲羸委于沟壑。历河朔而至太原,自淮沂而被洛汭,虫螟为害,雨泽愆时。然犹征赋未息,征役未宁,冻馁流离,寄命无所。”^⑨然而,战争并未因之而停止。元和十二年(817年)平定淮西吴元济后,宪宗又出兵讨伐淄青留后李师道。元和十四年(819年),唐朝终于平定了叛乱。为防止割据局面的重演,将淄青镇一分为三:淄、青、齐、登、莱五州为平卢军,节度使为薛平;郛、曹、濮三州为天平军,节度使为马总;兖、海、沂、密四州为兖海军,节度使为王遂。此后,山东地区的社会治安及经济恢复有所好转。据史书记载,平卢节度使薛平在镇六年,勤于治政,“兵甲完利,井赋均一。至是入觐,百姓遮道乞留,数日乃得出。时人以为,近日节制,罕有其比。”^⑩由于政绩突出,得到时人很高评价。密州是东部贫困落后的地区,刺史崔玄亮亦对当地人民进行救助,“民之冻馁者赈恤之,疾疫者救疗之,鬻骼未殓者命葬藏之,男女过时者趋嫁娶之;三月而政立,二年而化行。”(《白居易集》卷71,《唐故虢州刺史赠礼部尚书崔公墓志铭》)经过不懈努力,经济才渐有起色。大和三年(827年)唐朝调任在宣武镇有政绩的令狐楚为天平军节度使。大和五年(831年)刘禹锡作《天平军节度使厅壁记》,记载了他在经济建设方面的成就:“凡革前非罢供第无名钱岁巨万,菽粟如之,锦缯且千两。去苛法急征毁家偿租之令,故流庸自占四万室。”(《刘禹锡集》卷8)由于长期赋役繁重,百姓大量逃亡,令狐楚致力于减轻人民的负担,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大和六年(833年),节度使殷侑又实施“裁制经费,岁以钱十万缗、粟五万石归有司”(《新唐书》卷164,《殷侑传》),更为安定人心、恢复经济提供了较好的基础。

为进一步考察战后山东的经济恢复状况,下面对该地区的水利、丝织业等作一综合叙述。根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唐代山东水利工程分布在河南道的青州、莱州、兖州、沂州等四州,全部为战前所建,然而,战后这些地区竟没有新修一项水利

工程,山东水利事业因此处于停滞状态。唐朝前期两河丝织业繁盛,即所谓“河南北,桑蚕倍多”(《全唐文》卷269,张廷珪《请河北遭旱涝准式折免表》)。据《唐六典》卷二〇太府寺太府卿之职条载,全国生产的绢类丝织品按精粗分为八等,山东有二等、三等、四等、五等数种(二等:曹;三等:德、博、濮、兖;四等:齐、郛、棣;五等:淄、青、沂、密),丝织物品质优良,是全国丝织业分布的主要地区。战后山东丝织业发展脉络,可从一些史籍记载各时期贡品中加以考察。现以《元和郡县图志》所载开元贡、《通典》所载天宝贡为前期依据,《元和郡县图志》所载元和贡和《新唐书·地理志》所载长庆贡为后期依据。战争前后山东丝织贡品没有发生变化的是郛州、濮州、棣州、德州。战前有丝织贡品的青州,战后增加了一种丝织贡物,而兖州、齐州增加了两种,进步较快。战前原无丝织贡品的博州增加了一种,曹州则增加了两种,发展最为迅速。

总之,山东各地经济在战后虽然有所恢复,但因安史之乱中破坏严重,人口大量减少,恢复之路走得十分艰难。战后各藩镇又争斗不已,和平时期较少,百余年中几无宁日,所以战争与和平交织下的山东地区的经济恢复和发展速度都非常缓慢。

综上所述,安史之乱给山东经济带来重大破

坏。战后,虽然各级统治者采取措施努力恢复经济,但并没有收到显著的成效,山东经济一直在缓慢的发展过程中,有些地区经济处于衰退状态,始终未能恢复到原来的程度,安史之乱造成的创伤很难得到迅速愈合。在藩镇割据的不断影响下,战后山东社会秩序极不稳定,生产力在恢复中往往遭到破坏,在破坏中再重新恢复,经济建设经历了艰难恢复和缓慢发展的过程。正因为受到各种条件的制约,其发展是有限的、不充分的。这表明了社会生产力一旦遭到战争的严重破坏,要想迅速恢复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经济重建难度非常大。可见,社会的稳定对经济发展至关重要。

注释:

- ①《唐六典》卷3,《尚书户部·郎中员外郎》。
- ②《资治通鉴》卷217,《唐纪三十三》。
- ③《白居易集》卷12,《长恨歌》。
- ④《资治通鉴》卷218,《唐纪三十四》。
- ⑤《唐大诏令集》卷119,《贬田承嗣永州刺史诏》。
- ⑥《太平寰宇记》卷19,《齐州·禹城县》。
- ⑦《文苑英华》卷915,裴抗《魏博节度使田公神道碑》。
- ⑧《唐大诏令集》卷121,《复田承嗣官爵诏》。
- ⑨《册府元龟》卷106,《帝王部·惠民二》。
- ⑩《旧唐书》卷124,《李正己传》,《李师古传》,《薛平传》。

On the Damage of Anshi Rebell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y in Shandong

SUN Tao¹, ZHANG Jin-gua²

(1. Linyi University, Linyi Shandong 276005, China;

2. School of Finance & Economics, Shanxi University, Taiyuan Shanxi 030006, China)

Abstract:Shandong is one of the main battlefields of Anshi Rebellion in Tang Dynasty. The war brought serious damage to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n Shandong. It led to a loss of a large number of people, resulting in a shortage of labor, large tracts of barren land, reduced food production, all of which brought seriously harm to the economy in Shandong. Water conservancy facilities had been seriously damaged by the disaster and the disaster reduced the capacity in turn, which seriously affected the recovery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until resulted into a long-term socio-economic slump in post-war Shandong.

Key words:Anshi Rebellion; the economy of Shandong; damage

责任编辑:张奎华